

交通史名家向達



▲載於《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內的向達照片

史藝兼擅

塵
紝



幅很小，全書只有四萬字左右，除緒論外，共分九章。但凡交通史，以至其他類別的史書，一般都以朝代或時代的名稱劃分，例如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等等，作為書內的章目；然而，向達這本交通小史並非如此劃分。雖然並非按朝代劃分，但所用章目，倒也別出機杼，不但讓讀者一新耳目，更可從章目得知些許脈絡。

書內章目鋪排特別

現將全書章目臚列如下，以便參閱：第一章「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第二章「中國與中亞」、第三章「中國與伊蘭文化」、第四章「印度文化之東來」、第五章「中國與阿拉伯的交通」、第六章「中國文化之東被與南傳」、第七章「景教與也里可溫教」、第八章「中古時代到過中國的幾位外國人」及第九章「明清之際之中西交通與西學」。

從上可見，這本小史的鋪排頗為特別。向達此舉，確有原因。他在書中正文之前所寫的「作者贊言」說明，他有感於西方學者Henry Yule所編譯而由Henri Cordier修訂過有關中西交流的論著「收羅很詳……考證也極詳審……提綱挈領，頗為得要，於是據此寫就這本小史。不過，Yule書內只提中西雙方交通，但沒有觸及中國文化的東被與南傳，又沒有提及中外交通在文化史上的收穫，更沒有花篇幅談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交通。」向達於是承接前書，稍予補述，寫成此書。

另一方面，向達在書內的「緒論」指出，交通史在史學界可以有兩種意思。其一，是專研交通制度本身，例如歷代交通工具的變遷；其二，是研究一地與另一地在各時代的交往情況，而這就是兩地之間文化交流史。向達的《中外交通小史》，專研後者。換言之，這是一本中外文化交流小史。

向達亦在書內「緒論」說明，「我這部小史斷限於張騫之通西域，止於乾隆之禁西教。」原因是「自漢武帝時代以後，中外交通才有正確的史料可以遵循。至於止於乾隆之禁西教者，則因為之前的中外交通，大部分是霧裏看花，不甚明白，一直到乾隆時猶是如此。雖是朝代屢易，這一點觀念卻未變更。乾嘉以後，中外交通的形勢起一空前的變革，外國正式以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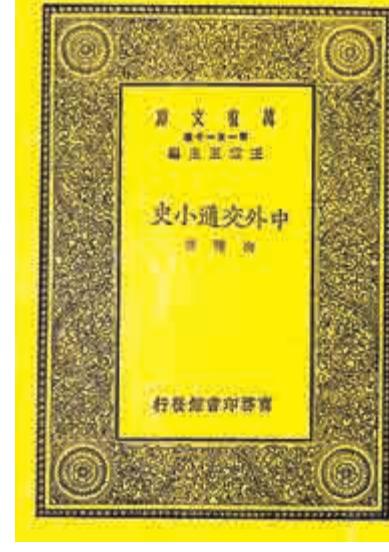
力壓迫到中國……」。向達隨後解釋，清代乾嘉之前，中外文化交流大都以中國為主體，乾嘉之後，中國處於被動。所以，他的小史專治以中國為主體的那段悠長交通史。

中國文化並不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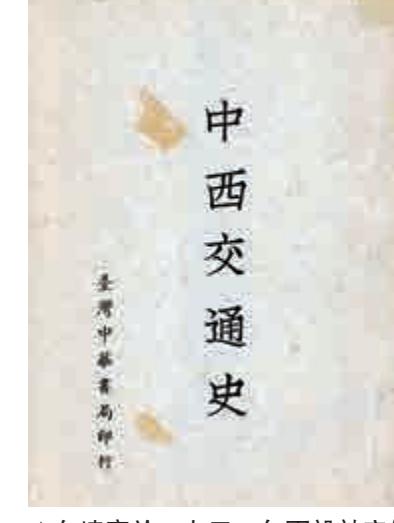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向達亦在「緒論」指出，「中國的文化並不是孤立的。」那邊廂，歷代以來，四方民族很想與中國交往；這邊廂，中國亦不斷深入他國。歷代例子，多不勝數；規模較大的計有：漢朝與匈奴及其他民族的互動、魏晉前後佛教自印度來華、唐朝文化東渡日本、南北朝及宋遼金元各代的異族被漢族同化，而漢族亦在同化過程中益見宏大。另一方面，「元明以後，中國同西洋又相接觸……凡此皆可以見中國文化實無時無刻不與其他民族發生關係。」

要寫一本目光廣闊的交通史，作者不但必須深諳外文，懂得研究西方史籍，更須從西方的文獻印證中西文化交流，務求做到中西兩種角度兼備，避免單靠中國史籍了解中西交流。這一方面，由於向達學養極深，長期在歐洲鑽研考究，絕對做到中西兩面反覆印證。

首先，向達在書內第一章即「希臘羅



▲向達寫於一九三〇年的《中外交通小史》



▲向達寫於一九三一年而設計完備的《中外交通史》

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內，以西方典籍印證中西交流。例如，他指出西方對中國這個遠方國家有兩種稱呼。其一是Sinae或China，其字音是蛻變自漢字「秦國」一詞的音譯，必須注意，China一字如果以英語發音，則與「秦」字相距很遠，如果以拉丁語或法語發音，則極為相近；至於Sinae一字，則較為明顯可辨。時至今日，西方稱漢學為Sinology，此詞當然是從Sinae一字演變出來。

古希臘羅馬時代對中國有另一種叫法，即Seres、Seras或Seria，意指中國的名產「絲」。由此可見，當時的西方是以「秦」或「絲」指稱中國。然則，Sinae及China與Seres及Seria這兩類稱謂有什麼分別？向達在書內指出，Sinae及China大抵是指從北方陸路傳去的中國，而Seres及Seria則指由南方海路傳去的中國。

為了印證此等稱謂，向達列舉不少西方典籍，包括荷馬及維吉爾的史詩、Horace、Ovid及Propertius的詩作，以及Strabo的《地理誌》、Pliny的《自然歷史》、Florus的《羅馬史略》，而以上的文史典籍，都是專研希臘羅馬文化的學者須予參閱的。

「葡萄」一詞源自希臘

此外，向達亦在書內提述一些頗為有趣的知識。例如，我們日常生活所吃的葡萄，原來是從希臘文翻譯過來的詞語，而這種既可釀酒亦可當作水果的植物，是漢朝張騫出使西域時有所見聞而帶回中國。另一方面，向達引述二十世紀初英國Giles的說法，指出中國的傀儡戲、猜枚、刻漏、樂律等物事，以及海馬葡萄鏡等文物，皆由希臘傳入。

上文提及的，盡載於書內第一章。至於其他八章，內容同樣有趣易懂，只可惜本文篇幅有限，未能逐章載述。

《中外交通小史》初刊後翌年，亦即一九三一年，向達發行另一本同樣講述中西文化交通的史書，題為《中西交通史》。與只有四萬字的《中外交通小史》相比，《中西交通史》篇幅雖然略大，但只有五萬字左右，因此也只能視作一本小史。

我手執的版本，並非三一年的初版，而是一九五九年由台灣中華書局印行的台灣第一版。我是七五年在台北購得。最有趣者，是出版商基於政治原因，把作者姓名隱去。如果讀者不知情由，根本猜不出，這就是向達的著作。

除「小引」及「敘論」外，全書分為十章，依次是：「中國民族西來說」、「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與也里可溫教」、「元代之西征」、「馬可孛羅諸人之東來」、「十五世紀以後中西交通之復興」、「明清之際之天主教士與西學」、「十八世紀之中國與歐洲」、「十三洋行」及「鴉片戰爭與中西交通之大開」。

從書內的章目可見，向達先由概論講起，然後大抵按照時序以若干特別課題論述。這種寫法在某程度上與之前刊行的《中外交通小史》確有重疊，其中一個明顯例子是《中西交通史》第三章「景教與也里可溫教」與《中外交通小史》第七章「景教與也里可溫教」章目相同。儘管如此，細觀這兩章的內容，重疊不多。簡單來說，向達這兩本書大可分開來讀而各有進益。

《中西交通史》設計完備

另一方面，《中西交通史》在內容設計方面，比《中外交通小史》豐富。首先，書末設有「中西交通大事年表摘要」，作為附錄；其次，書末備有中西文名詞索引，以便讀者檢索；其三，書內載有十多幅插圖。不過，向達所用的插圖，全部採自其他書籍，絕非親自繪畫，而所有出處，已於「插圖目錄」內說明。其四，向達在每章尾部，不但備有參考書目，而且中西兼備。其五，每章「參考書」之後，亦設有「問題」一欄，就該章學習所得，提出若干較為簡單的問題，俾使讀者閱後溫習。向達這種做法，想必是仿效西方帶有教學功能的學術論著。

除了上述兩本專書，向達還在不同年月寫過很多關於中西交通（文化交流）的文章。單以一九五七年初刊而長達四十六、七萬字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論文集而言，就收集了好幾篇重要的文章，計有：用作書名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古地理書敘錄」，當中以首篇亦即用作書名的文章「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篇幅最長，並且最受重視。

此篇寫於一九三三年的文章最受重視，主因是填補了學術界對於這個課題的不足。據向達親述，前輩史家馮承鈞（一八八七至一九四六）之前在《東方雜誌》發表「唐代華北蕃胡考」雖然考證精確，但僅以蕃胡華化為限，而所取材料，只囿於《舊唐書》和《新唐書》兩本正史，的確稍嫌不足。至於日本漢學家桑原鷹藏（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一）的「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一文，則以人為主，而文物及諸般方面，卻無略述。向達有見及此，奮發為文，以唐朝由西域傳入之文明而與首都長安有關者，逐一排列，依次敘述。他在文內逐一討論「流寓長安之西域人」、「西市胡店與胡姬」、「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長安打毬小考」、「西亞新宗教之傳入長安」及「長安西域人之華化」。文末備有兩個附錄，其一是「柘枝舞小考」（「柘枝舞」屬於佛教樂舞裏「健舞」的一種）；其二是「整屋大秦寺略記」（其時的整屋，位於南山之陰，距離西安百多里）。

馬球由波斯經西藏傳入

這篇長文，記述範圍廣闊。例如他在「長安打毬小考」的一段裏，指出波羅毬（即Polo）是一種發源於波斯而西傳至君士坦丁堡及東傳至印度、西藏、中國以至高麗和日本的馬上打毬之戲。唐人擊毬，例以龜茲鼓樂助興。向達甚至在該段文章力證，波羅毬在唐太宗年間才開始傳入中國，而唐代以前，只有蹴鞠。唐代皇帝如玄宗、宣宗、僖宗等，均擅擊毬，而僖宗除了精於擊毬，亦擅蹴鞠鬥雞。

這篇長文的確就唐代西域流入長安以及長安市內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提供豐富史料，其中更涉及繪畫、舞蹈、音樂等藝術，足見向達史藝兼擅。其實，除了這篇長文，書內所收集的多篇文章，例如佛曲考、龜茲琵琶考、敦煌文學、寶卷文學、明清美術等，都是關乎藝術和文學的論著。如果學養不深，根本寫不出前述文章。他的學養，絕對值得景仰。

根據統計，向達歷年作品連譯作約有一百，當中以單行本或編合成文集而坊間可以購得者，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尚望有心人將其餘專文匯集成書，俾能廣傳後世。



▲張星烺編集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與前著《中外交通小史》不同，向達在《中西交通史》首章便處理中國民族是否來自西方的說法。「中國西來說」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及至向達成書的上世紀三十年代，此說仍然方興未艾。持此見者認為，中國民族源出巴比倫……中國百姓即巴比倫的巴克族。這一族人移居中國以後，對於本國的舊習以及傳說，尚保存不少。如洪武傳說的存留，神農即巴比倫的薩貢，倉頡即巴比倫的同基，黃帝即巴比倫的那洪特……中國同巴比倫的文字有很多相似的，必是出於一源的民族（見書內頁三至四）。

向達所處的年代，礙於考古學及其他相關科學的發展尚處萌芽階段，「西來說」根本很難有足夠證據核實或否定。不過，向達指出：「要證明中國民族是否源自西方，一定要把地下的材料和紙上的文獻，充分找出來，然後驗之制度、文物、古



▲向達於一九五七年初刊的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奉獻史學 著作等身

向達（一九〇〇至六六）於東南大學畢業後，歷任編譯所編輯、圖書館編委、大學教授、圖書館長及研究所副所長，更畢生獻予史學，尤專中西交通史。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向達以北平圖書館交換員身份，先後前往歐洲倫敦、巴黎、柏林等地的博物館及圖書館檢索及抄錄敦煌古卷及其他以漢文記敘的史料。其間，曾受館方負責人刁難怠慢，以致抄錄過程艱辛難耐，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停留大英博物館檢索敦煌古卷及漢文典籍時，因館方人員處處為難，抄錄

數量銳減。不過，他從歐洲各地抄錄了關於敦煌、《永樂大典》、太平天國、耶穌會、吐魯番、西域等方面的資料共幾百萬字回國。另一方面，他以不同名義及身份，參加考察團多次前往敦煌地區考察，從出土文獻抄錄資料。

歐洲及西北之行，委實有助於他寫就

「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瀛涯瑣志之一」、「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

、「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西征小記」、「玉門關陽關雜考」等文

，當中大都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文集內，成為交通史及敦煌學的重要



東南大學大禮堂